

189

2256
Z756

融合中的创造

——夏衍与中外文化

周 斌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合中的创造:夏衍与中外文化 / 周斌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
ISBN 7-309-03434-1

I. 融... II. 周... III. 夏衍(1900~1995)—文
艺思想—文学研究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083 号

融合中的创造——夏衍与中外文化

周斌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4348(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一版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3434-1/G·478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应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曾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同时,它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显著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其影响十分深远。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是与中国的封建制度相适应的产物,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守旧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照,这就决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进行辩证分析和有所取舍,要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并以此来建设新的文化。

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是人类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历来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之关系,也同样是如此。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输入,直接刺激了中国新的文化系统的形成,并激化了新的文化系统同原先文化系统的对立与冲突,使中国文化二元化的进程常常同中西两种文化的互相撞击纠缠在一起。”^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始终伴随着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以及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中回眸 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进程,可以清晰地发现它是一个开放型的运动过程:一方面,它跟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持着承续的关系,批判地吸收其精华;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受到域外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从中学习借鉴

^①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 40 页,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有益的成分。正是在中外文化的交汇互渗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依据其接受主体的不同特点和所处的特定环境与氛围,在文化接受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在为我所用的“拿来”之基础上,在融会贯通中形成了各自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内容和色彩,而且为其不断拓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夏衍是在五四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之初正式登上文坛,开始其文学活动的。与鲁迅、郭沫若、叶圣陶、沈雁冰、郁达夫、冰心等新文学的最初的开拓者相比,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并不算最早。然而,由于他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直接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和新文化的影响;且又赴日本留学多年,吸收了大量域外文化的营养,拓展了视野,提高了素质,使其文化知识结构更趋完善;而回国后又一直奋战在民族、民主斗争的第一线,与时代生活和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这就使他在学识、修养、阅历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学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们相仿,均有较丰富的积累和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活动中,既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艺术地表现生活和概括历史中开掘文化内涵;又能注重兼收并蓄,努力将中外文化的精髓有机融会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个性,终于在话剧、电影、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翻译和理论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卓然成为新文学之大家。

众所周知,任何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而文化生产就其本质而言,则是一种文化特质的创造过程。这种创造显然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总结人类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习借鉴前人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从已有的文化特质、要素中进行的一种再创造。因而,当我们论及任何作家、艺术家时,都应把其创作活动,即文化生产活动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

景下审视,弄清其与中外文化传统的关系及所受到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在他的再创造中有哪些新鲜、独特的东西,及其为文化积累和发展作出了多少贡献。本书对于夏衍及其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评析,即注重从这一角度入手。

作为 20 世纪的同龄人,夏衍的一生基本上经历了新文学发展变迁的各个历史阶段,故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思想发展、人格形成、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活动,梳理、探讨其内在的渊源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夏衍及其作品,明了其在文化上的创造、贡献及不足之处;又有助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案,具体了解新文学的发展与中外文化的内在联系。

由于夏衍是多面手,其创作和理论批评涉及到话剧、电影、报告文学、杂文随笔散文、小说、自传等各个领域,故具体而言,笔者将在这些领域里结合其创作成果,较详细地论述其与中外文化的多方面的关系,分析其作品的美学构成因素及富有个性的风格特点,也探讨其缺陷和不足之处,并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可以借鉴的规律。

在此之前,将首先对夏衍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影响作一些论析。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人生观:文化碰撞中的抉择	1
一 与封建传统思想决裂	2
二 在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9
三 人格形成中的文化影响	14
第二章 文艺观:中外文化的构成因素	28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28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核心	37
三 欧美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	48
四 日本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	51
五 俄苏文艺的浸染	55
第三章 话剧:在借鉴中自成一家	62
一 与中国古典戏曲和文学	63
二 与狄更斯	81
三 与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	85
四 与高尔基	93
五 借鉴电影技巧	102
第四章 电影:在拿来中大胆创新	106
一 继承和发展了戏剧电影的传统	108
二 与苏联电影学派	145

三 与西方电影文化·····	155
第五章 报告文学:富有个性的创造 ·····	162
一 在创作实践中探索艺术规律·····	164
二 注重从域外吸取营养·····	167
三 《包身工》:里程碑式的作品 ·····	169
第六章 杂文随笔散文:独具风格的写作 ·····	178
一 杂文:针砭现实,匡正时弊·····	179
二 随笔:不拘一格,独抒性灵·····	196
三 散文:写人记事,情感深沉·····	220
第七章 小说:尝试中的探索 ·····	240
一 最初试笔的失败·····	241
二 《春寒》的探索与特色·····	245
第八章 自传:历史反思和人生总结 ·····	256
一 《懒寻旧梦录》:尊重历史,自我剖析·····	257
二 未能写完的人生总结·····	281
结 语 ·····	284
后 记 ·····	289

第一章 人生观:文化碰撞中的抉择

在已经逝去的 20 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出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其中,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乃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变化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由于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传统思想的枷锁尤为沉重;而早在 19 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因此,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是在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之下,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之中进行的。

正是这一过程,造就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和崛起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夏衍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诞生于 1900 年,逝世于 1995 年,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堪称世纪同龄人。“夏公与世纪并存的一生,都在回答世纪的召唤,从青年时代始,就紧紧追踪时代潮头,至耄耋之年而不稍懈。他的辉煌与挫折,他的欢欣和忧患,都是世纪坎坷历程的投影。”^①他既是历史变化的见证人,也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因此,剖析夏衍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探讨其与中外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 20 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崛起的历史及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① 罗艺军《夏衍和 20 世纪》,载《文艺研究》1995 年第 1 期。

一、与封建传统思想决裂

2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的国家,因而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尤为根深蒂固,它像一条又长又粗的魔绳,紧紧束缚着中国民众的思想。为此,挣脱这一魔绳的束缚,解放思想,努力赶上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则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了有力冲击。当时提出了两个鲜明的口号:一是科学和民主,二是打倒孔家店。而后的内涵,即是指打倒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旧文化、旧道德。显然,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真正接受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才能打倒旧文化和旧道德;反之,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土壤,才能使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得到普及。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旧道德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未绝迹,其影响和危害仍然存在;一遇适当的气候,则大肆泛滥。故而,打倒封建主义,与传统思想决裂,实际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夏衍在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五四”杂忆》中所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花甲’。然而当时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却依然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当时以为不难推倒的封建主义,它的经济基础今天已经摧毁,但它那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思想意识到现在还极其顽固,阻碍着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①这种认识既来自于夏衍对历史变革的正确概括,也来自于他对自己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的深刻总结。

夏衍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里,其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官”,到了

① 《夏衍近作》第1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夏衍祖父那一代，家道日益衰落。祖父沈文远读过书，曾被太平军“俘走”，当过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战败，才回到杭州，因此缘故，他未曾应试，也没有功名。祖母章氏，乃章太炎的堂房姊妹。父亲沈学诗，是一个不第秀才，因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为当地的农民治病，其医道颇好。母亲徐绣笙，虽识字不多，但性格坚强，心地善良，对孩子的文化教育也很重视。夏衍是父母的“老来子”，上有兄姐七人（两人早逝）。在他三岁那年，父亲因中风而去世，家庭重担全由母亲承担。当他开始懂事时，家境已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为生活所迫，其长兄去当铺当了学徒，大姐则嫁给舅父的长子作了“填房”，三姐也被送给住在苏州的四叔，二姐和四姐还要做些“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

家庭的变故和衰落，使夏衍从小就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他幼年所穿的衣服和鞋袜，都是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为能读书，又不得不在姑母和舅父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高小毕业后，因无钱继续升学，并为生计所迫，只好去染坊店当了学徒。后来虽然被保送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但学、膳、书籍费仍需母亲向亲戚朋友借贷。这一段穷困艰辛的生活，夏衍直到老年时回想起来仍颇感心酸。他在《懒寻旧梦录》里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当然，穷还是紧紧地缠着我，杭州多雨水，特别是黄梅天，可是直到二十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成而在脚底上有铁钉的雨具）。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又没有换替，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

里走路。”^①可见这段生活经历在他心灵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社会民众,了解劳动人民的痛苦。特别是他在染坊店当学徒的经历,更使他对劳苦大众的生活有了直接的体验。所以,尽管夏衍从小就进私塾、读《三字经》、学《论语》,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但这一切并未最终使他成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他从家庭变故、自身经历和民众痛苦中,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罪恶,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反抗情绪,萌发了一种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进中学那一年,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弱肉强食’的世界,油然而发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②为此,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五四运动一爆发,就深深吸引了夏衍,促使他积极投身于这一时代潮流,成为杭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作为一个激进的爱国青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新文化和新知识,“反正只要提倡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礼教的书,什么都读,的确也‘不求甚解’,同时,也颇有一点偶有所得,便欣然忘食的意思。”^③并参与创办了浙江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刊物《双十》(后改名为《浙江新潮》)。他从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吸取了思想的活力,进一步确立了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理想。

当时,“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颇为盛行。这是因为自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反省,并努力探寻西方强盛、中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2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② 《夏衍杂文随笔集》第5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促使民族复兴的途径。当时不少人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发达和物质文明,遂提出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

年轻的夏衍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但尚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依然支配着我。”^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东渡扶桑求学,并选择了学工,有志于使自己成为一名工业专门人才。然而,由于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社会科学著作,参加了各类进步社会活动,特别是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在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实业救国’的念头渐渐消失了,毕业回国当工程师也觉得不值得羡慕了。”^②故而,他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担任了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在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中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买办政权的建立,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复辟。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夏衍不怕白色恐怖,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更高地举起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回国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此后,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又进入文艺界,担负起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重任;并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成为一名杰出的革命文艺家。

从一个破落大家庭的“老来子”,到一个激进的爱国青年,进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和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所走过的这条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这一辈人走过来的道路,是崎岖的,我们这一辈人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是戴着脚镣

①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57页、84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手铐,而且经常受着反动空气的威胁的。”^①这里所谓的“戴着脚镣手铐”,主要是指受到各种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影响。这些束缚和影响,既来自于家庭出身与教养,也来自于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等方面。就夏衍而言,生于没落的“书香世家”,自幼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使他与这样的家庭在精神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给他的思想感情以一定的影响。对此,夏衍曾在《旧家的火葬》一文中这样说过:“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②显然,夏衍曾清醒地意识到旧家与他思想感情上的某些软弱之处的内在联系及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他为此挣扎过、抵制过,企图彻底割断这些联系,消除这些影响。故而,当他听到旧家火葬的消息时,自然流露出一种喜悦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则真切地反映了他决心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封建家族势力彻底决裂的心情。

的确,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以后是需要加强世界观改造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挣脱身上的“脚镣手铐”,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上得以彻底的转变,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这种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显得尤为必要,对此,夏衍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论述,他说:“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可是在政治斗争的领域之内,我们的斗志是昂扬而坚定的。因为在这个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迫害,所

①② 《夏衍杂文随笔集》第 570 页、32 页,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以对这三个敌人的憎恨和反感是强烈而深刻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要和它斗争的敌人主要是在我们身外,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要和它斗争的敌人却在我们自己的灵魂深处了。这就是和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思想感情决裂的问题,这就是自我改造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革自己的命’的问题了。按我自己的体会,革思想感情的命,要比革政治制度的命困难得多,苦痛得多,因为,这个长期潜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敌人是一个最顽强的敌人。且放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身和教养不谈,由于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和个体生产者,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从事的业务本身,就包含着容易轻视劳动和轻视集体的特点。这种特点,有意无意地阻碍着我和工农群众的接近和结合。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有关知识,有文化,总以为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高一等,最初是想以启蒙者自居去启工农群众之蒙,接着是想以义勇军或者志愿军的姿态去‘帮助’工农阶级,以为这样做就已经是舍己为人,应该得到工农群众的感谢和报答。应该承认,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带着强烈的优越感和个人英雄主义去接近群众的。因此,当他们勉强通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时候,当他们听说要老老实实在地改造自己,向工人阶级学习,要决心向工人阶级投降和归顺的时候,两种不同的、对立的 worldview 就猛烈地发生冲突了。现在看来,这种矛盾和对立的主要点,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冲突。现在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不能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主要关键,就在于他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抛弃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的包袱了。”^①尽管夏衍的这些分析论述写于1958年,难免不受到那一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重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强调知识分子要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在这

① 《夏衍杂文随笔集》第566页—568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方面,夏衍自己则身体力行,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完全摆脱“脚镣手铐”,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十年浩劫之后,夏衍从林彪、“四人帮”的肆虐之中,从民族的悲剧和自身的遭遇之中,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与旧的传统思想彻底决裂的重要性,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不断阐述这一见解,认为文艺创作要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他曾这样说过:“因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虽则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新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事情。”^①他也曾这样反思过:“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十年之久?我从苦痛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十七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东西也要反掉,六十年代又提出了‘兴无灭资’、‘斗资批修’这样不科学的口号。十七年中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经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②故而,他认为反对封建主义、清除封建思想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文艺作品一定要强调和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抨击封建迷信。”^③他自己虽近耄耋之年,仍表示要像屈原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决心和毅力是令人钦佩的。

①③ 《夏衍近作》第42页、2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42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二、在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便迅速传播开去。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复杂多样的,域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学说都蜂拥而来。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说,对于那些热烈追求新思潮而一时尚缺乏鉴别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在新文学作者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批判。从1919年至1921年,中国思想界曾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无论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还是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或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论争中都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从而帮助不少知识分子区分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由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俄国的十月革命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获得胜利的明证,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论争所取得的胜利,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在一定范围内终于发展成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

夏衍接触、接受马克思主义,直至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五四时期,因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故夏衍也受到其影响。对此,他曾作过这样的回

忆：“我当年十九岁，血气方刚，受到一些新文化影响之后，就一直在思索今后的出路。有一次孙敬文介绍我去见沈玄庐，他送给我一本小册子，是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这本书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当时，我只是对现状不满，自己穷，又不想向有钱人低头，但根本想不出也找不到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而这本小册子，才使我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造社会。”^①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在夏衍思想上引起震动的，不是其关于“爱”和“互助”的说教，而是有关“社会革命”的论述，并由此认识到改变现状的出路“就在于改造社会”，在这方面受到启发。然而，夏衍没有像巴金那样，多方面地、深入地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并虔诚地信仰它，故而，无政府主义理论对他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渴望变革现实的进步青年，在寻求新的思想武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和一定的鉴别力，对各种外来的思潮和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此期间，他虽然参加了浙江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可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头脑里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②

夏衍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先是认真地学电机工程，后来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认识了几位日本的进步青年，参加了政治活动。”由此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在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③

夏衍最初是怀着“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赴日考入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的，但是，他毕竟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特别是1923年暑假

①③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0页、65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② 《夏衍杂文随笔集》第565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